

融通与创新

——评刘尊明教授新著《唐宋词综论》

刘荣平

(厦门大学 中文系, 中国 厦门 361005)

《唐宋词综论》(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 2004 年 12 月第 1 版)一书,系刘尊明先生近十年来词学研究成果的结晶与荟萃。其中有些章节,已先期作为词学研究论文发表在《文学评论》《文学遗产》《文艺研究》等重要学术期刊上,曾引起读者的广泛关注,有些章节则尚未发表。今刘先生能够整合成书,而各章各节又有内在的逻辑联系,说明著者近十年来的治学与积累已涵盖了词研究的方方面面,并非一般泛泛收集论文之著作。

全书共分八章,即“审美体验论”、“词学思想论”、“形体艺术论”、“内容题材论”、“创作主体论”、“发展史论”、“传播史论”、“学术史论”。既有宏观融通的理论探讨,又有精细透辟的微观考证;既有传统治学路数的延伸,又有新方法新理论的运用。刘先生早年师从著名词学大师唐圭璋先生研治词学,秉承乃师“会通”之治学宗旨,于文学、史学、哲学、文化学、传播学、计量学均有涉猎,熔铸一炉,综合运用,服务于词学研究,故能在融通之中见创新。

通观刘著,第一个亮点就是强烈的突破意识。由于著者长年浸润于词学园地,养成了敏锐的学术直觉和超强的判断力,故书中的一些选题多能给人耳目一新之感。先说理论探讨,如第四章“内容题材论”中《唐五代词与道教文化》《宋代寿词的文化内涵与生命主题》二节,即是刘著中最为光彩夺目的篇章,闪烁着智慧的光芒。就前者言之,唐五代小词本是娱宾遣兴的产物,很难想

像能与道教有什么瓜葛。一般论者囿于“词为艳科”的传统,注意力只集中在它的娱乐功能上。而著者通过对唐代道教发展史的清理,用不争的事实论证了道教音乐与隋唐燕乐的关系,又通过对现存少量的道教歌词和世俗歌词对道教文化的反映之探讨,二者难以分割的关系就昭然若揭,其根源即在于道教的浪漫世俗情调与文人雅士的艳情享乐相拍合,由此引发出多方面的双向互动。如此阐发,确实“获得了一个新角度的、更全面、更深入的观照与体认”(第 114 页)。就后者而言,宋代确实存在大量的寿词,它改变了宋代以前寿辞创作不发达的现状,那个时代的人们为什么多用词而不是多用诗来祝寿?刘著研究结论是:宋代自上而下盛行祝寿,寿词的兴盛与整个社会的游乐风气有关;与特异的社会心理有关;与理学的兴盛有关。在此基础上著者进而揭示出宋代寿词由“他寿”到“自寿”的演进历程,使人看到宋代祝寿活动中生命主题是如何得到咏叹的。曾见有人撰写单篇论文来讨论宋代寿词,却远未及刘先生全方位的发掘,能拿出如此令人信服的结论。次说微观考证,如所考“福唐体”、“丁大使”、“康与之”等篇章,都是词学话语中出现频率甚高的语汇,一般论者只是在特定语境中去粗略领会涵义而不作深究。今刘先生用力地探幽发微,不但使研究对象本身从历史迷雾中浮现出来,使我们看得更清晰,而且相关的意义也一一辨明,遂使论者在引证材料时不至于发生偏差。另如李煜佞佛

收稿日期: 2006-01-24

作者简介: 刘荣平,男,湖北洪湖人,厦门大学中文系副教授,文学博士。

© 1994-2012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 <http://www.cnki.net>

招致亡国一事,虽有学者触及之,但没有作系统研究,今刘先生的《李煜与佛教关系考述》一节,使我们看到李煜之佞佛误国远大于他的才艺误国,这或许是他不同于其他亡国之君的一个突出的方面。

刘著的第二个亮点,即是多门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。不能就诗论诗或是就词论词,已是学界的共识。如何更有成效地研究诗词学?社会文化学的分析方法曾广为流行。刘先生擅长此法,前面提到的两篇文章就是此法的成功运用。其它章节亦多运用此法,如《唐五代宫廷词的文化内涵》《苏东坡的人生幽默与文化意蕴》等篇章,此不赘述。此处提一提传播学与计量学方法的运用。西方接受美学认为,艺术品在读者未接受之前,只是一个艺术的成品,只有在读者接受之后,它才获得艺术的生命。因而从受众的角度来考察词人的词史地位,就不失为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。第七章《传播史论》分别考察了著名词人温庭筠、周邦彦、李清照的词史地位。虽然因为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导致文章的写法各异,但可以看出一个基本的思路:由口头传播到别集传播到选本传播,它们共同凝定词人的词史地位。此法看起来简便易学,后学亦乐于采用,但真动起手来,便会感到困难重重。如论周邦彦,著者开列了宋元明清近代周邦彦词集版本一览表,达37种;又开列了宋明清以及词谱选录周词一览表,达51种,其覆核之功,直使人欲说还休,这里面包含着巨大的劳动,需要极大的毅力。至于第八章《学术史论》则主要运用计量分析的方法探讨李煜、柳永、苏轼、秦观的研究现状。十年前,王兆鹏教授和刘先

生合力撰写《历史的选择——宋代词人历史地位的定量分析》(《文学遗产》1995年第4期),开词学统计分析之先河,今为词学界普遍采用。自此以后,刘先生更多地运用此法来评估词人及其词作的研究现状,为以后的相关研究指明新方向。其基本思路即是:词学研究总成果到著名词人研究成果,再到该词人研究成果及时代分布,再到该词人研究成果分类,在此基础上分析原因并指出今后的研究方向。相对于传播学角度的统计分析,此法较简便易学,但统计的工作量也不会少。

刘著的第三个亮点即是在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推出新意。欧阳炯、辛弃疾及辛派词人、苏东坡等都是经常受到关注的对象。如何推陈出新,别开生面,就是研究者首先考虑的问题。刘先生当然也不能回避这一点,他的做法是要么重新整合,作系统梳理;要么侧重一面,避熟就生。如论辛弃疾及辛派词人,就着重考察此派词人的词学思想的渊源,前人并未这样做过;如论苏东坡,则只论其幽默及幽默在苏东坡人生中的演进轨迹。刘先生的成功研究当能启发后学:不要怕重复研究,关键是研究前要做好学术史检讨,以明确自己研究所要达到的深度与广度。

拜读刘先生的大著,收获良多。但该著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局限性和不足之处,如《二十世纪柳永研究的回顾与反思》一节遗漏了薛瑞生先生和施议对先生的研究成果,又如有关“福唐体”的考辨也不够精细深入,此外对计量分析方法运用也还有待进一步完善。

责任编辑 高翰